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工业革命为什么不会发生在中国

托克维尔的“反华”言论

现实主义的张力和中产阶级溃烂

“东瀛屐痕”之一 ——“散都”东京

沙弥澄真

徐志摩为什么反对苏俄

多余的居民

宝岛生态访学记 ——我的台湾交流见闻

2013年01~02月 第7卷第1期

2013年01~02月 第7卷第1期

总第62期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　庆　言　一
汪　伟　扬　克　孙骁骥　灵　子

轮值编辑

扬　克

观察员

文学：朱　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羽　良（北京）
刘　柠（北京）　严　飞（美国·旧金山）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　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　葭（香港）　罗四鸰（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　克（德国·图宾根）
灵　子（北京）　燕　舞（北京）
吴　强（北京）　言　一（成都）
米　格（广州）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北京）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编者按

和家人打电话说起国内的环境污染，问我德国的空气、水怎么样，我就如实说起来四十多年前伦敦的雾霾也和现在的北京一样严重，二三十年前德国一些工业区的河流也和淮河一样浑浊发臭，但我很难用语言向他们形容这几年在欧洲见到的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湖泊和城市里带着植物清香的空气，因为我的家人的一切想象都受他们在国内的所见所闻限制。对于大多数刚刚摆脱小农生活状态的中国人来说，全世界都和中国差不多，好起来的话顶多是河南和广东的差距，而坏起来哪里都一样。

在德国碰到的一位读环境工程的中国留学生却又是另一种心态。她用专业素养告诉我，德国以前的环境污染也非常严重，所以虽然中国现在的情况这么糟，但只要想治理，有一天也会和德国一样。对她而言，只要有技术、用技术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至于欧洲近四十多年来的环保社运、环境工程的民主决策以及选民对地方政府的民主约束等等条件则一概不谈。于是，她又抱着另一种矛盾的想法：“我并不想改变现实。”

当所有人都不想改变现实的时候，雾霾天什么时候才能散去呢？

目录

封面用图
The masterpiece or
the mysteries of the horizon
Rene Magritte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经　济 • 苏小和
写　作 • 戴新伟
文　史 • 王晓渔

005-015

阅读报告 台港海外

美　国 • 罗四鸰

016-019

书评

• 孙晓骥
工业革命为什么不会发生在中国

• 王晓渔
托克维尔的“反华”言论

• 朱　白
现实主义的张力和中产阶级溃烂

020-028

游记

• 刘　柠
“东瀛屐痕”之一
——“散都”东京

• 成　庆
沙弥澄真

029-036

随笔

• 林建刚
徐志摩为什么反对苏俄

• 言　一
多余的居民

• 何　鑫
宝岛生态访学记
——我的台湾交流见闻

037-051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suxiaohe@gmail.com)

农历年腊月23，我拿到了《夏道平文集》，当晚就看，一直看到凌晨2点，竟然到落泪。这一方面是因为夏先生自由的思想，经济学的趣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夏先生对他的孙子夏明的谆谆教导。夏明是湖北经济学院的教授，华人哈耶克学会的参与者之一，和我算是朋友，他有这样博学又温婉的爷爷，让人好羡慕。夏明不仅从爷爷那里学到了知识与思想，而且从爷爷那里看到了基督信仰。不久前，夏明终于被神拣选，成为一名基督徒。我没有这样的爷爷，祖上几乎无人认识神，也无人以读书为业。但我却早就被神拣选，现在也能深深地理解夏道平先生的思想和人生。我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属于我的幸福。我要感谢我的神，是神带着我读书，思考，写作，带着我经历幸福与苦难，带着我渐渐读懂了生命。

当然啦，说这些，纯粹是一些私人感受。我还是主要说说夏道平这个人，因为他是台湾知识界的公共人物，用今天大陆的热门词汇来讲，夏道平先生长期以来都是台湾当仁不让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要说的第一点，是夏道平先生与《自由中国》这本杂志的关系。大陆有点见识的读书人，大概都知道台湾大名鼎鼎的杂志《自由中国》，这本杂志在至少11年的时间之内肩负着整个台湾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影响力可

夏道平夫妇与蒋硕杰夫妇

谓巨大。因此台湾有《自由中国》四大撰稿人的说法，这四个人就是，胡适、殷海光、雷震、夏道平。这个名单足以让很多此前不认识夏先生的人震撼了吧。事实上夏道平先生主要负责《自由中国》与经济有关的社论写作，从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大概11年的时间之内，杂志一共出版249期，发表社论429篇，其中由夏道平先生执笔的社论为116篇。大家可以先看看夏先生的一些文章标题，比如《政府不可以诱民入罪》、《哈耶克论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经济学家不该是学官两栖的动物》、《走出社会正义的流行迷思》、《简谈长期出超和外汇激增》、《自由主义与宗教》等等，我仔细读过这些文章，一个基本的印象是，今天大陆的以经济学专业切入公共话语体系，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或许还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夏道平先生在台湾50年代的思想高度，至于这些言论对民众的影响力，其差距更是不能望其项背了。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夏道平先生的翻译。在过去的《独立阅读》的某一期，我曾经洋洋洒洒写了大概5000字，推荐夏道平先生翻译的巨著，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鼻祖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来看看。那是一座经济学思想的高峰，是夏道平先生第一次把这样的大思想家带到了华人世界。关于这本书的翻译，大陆这几年也是热闹。先是2010年广东经济社推出了一个译本，名为《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书生李华芳认为，“这是我见过最不负责任，最粗制滥造，最令人发指

的版本。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发表在《读书》关于维也纳的回声一文中关于米塞斯的文字截取，放在封底作为推荐语，迄今为止没有人知会和联系过我。当然，更让人不堪忍受的是触目惊心的翻译，仅举一例，在目录中，The Ricardian Law of Association被翻译成了“李嘉图的相关理论”（p3，目录）。这基本上是一部跟Google翻译差不多的半成品，却不知道为什么被搬上了台。实际上，这本书的中译书名也可见其质量，译成了《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完全画蛇添足，不知所云。而且与加里·贝克尔的名著无法区分开来”。华芳的评价，我非常赞同，有趣的是，那个译本也把我对米塞斯的评价印在了封底，也是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人和我联系。或许是因为出版社太着急把书印刷出来吧。反正我人微言轻，又是经济学的票友，也就无所谓了。

最近，关于这本书，大陆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译本，这就是余晖先生的译本，世纪出版社出版，书名翻译为《人的行动》。我因为还没有阅读，所以就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想来余晖先生辛苦了，有一次饭局，他和我说起过这个译本，当时很诧异，还问起他，和夏道平先生的译本比，他的译本的特点是什么。不过饭桌上人多，声音吵闹，就没有把话题往深处扯。回头认真读读余晖的译本吧。

又及，据说山东的冯克利师也在翻译这本书。克利的翻译，我向来是推崇备至的，曾经仔细啃过他翻译的《哈耶克评传》，如今回想起来，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冯克利师自学成才，年青的时候一边趴在汽车底盘下拧螺丝，一边啃英文学术书，人家真是聪明且勤奋，想起自己年纪一大把，英语总是烂了再烂，怎么学都学不好，就觉得惭愧复惭愧。总之，到目前为止，关于米塞斯《人的行为》，最靠谱的译本，只能是夏道平先生的译本。有兴趣的朋友读读吧，只要你愿意翻开书，夏先生的自序，就能把你抓住，反正我当年的阅读体会就是这样。夏道平先生对自由的理解，沿着经济学专业的层面，那真是入木三分，让人心领神会。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夏道平这一代台湾经济学者的群体风景。据说国内的经济学前辈张曙光教授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台湾经济学思想史的著作，很是期待。有一次在一个圆桌会议上，我听见曙光先生讲起过这个课题，老人家很兴奋，一边夸赞台湾经济学的整体水平之

高，一边批评国内的经济学思想的水平之低，之粗俗。说的是薛暮桥、马国光这些老前辈，基本上是苏联的经济学那一套，无足挂齿。吴敬琏仅仅在美国做了几年访问学者，没有像样的经济学论文，林毅夫是有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不过现在已经是官第加身，不太说经济学的实话了。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几个台湾经济学界的大思想家吧。

蒋硕杰，将新古典经济学派与重货币学派的思潮带进台湾经济学界的经济学泰斗级人物，他的经济学理念深深影响了台湾近50年的经济发展。曾就读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1943年由于哈耶克本人的推荐，蒋硕杰得到一笔奖学金，重回伦敦政经学院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在经济学刊

（Economica）撰文批驳凯因斯（Keynes）人口成长与就业关系的文章。1944年又于经济学刊发表批判尼古拉斯·卡尔多股票投机学说的文章。之后撰文批评剑桥大学资深教授庇古（A. C. Pigou）所著《就业与均衡》部分内容之错误，直接导致庇古认错，并修改其书中二章内容。1945年以流动分析（flow approach）理论探讨经济发展，获得经济学博士。蒋先生曾经在国立北京大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任职，后出任台湾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之后又担任首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最为重要的是，蒋硕杰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这样辉煌的学术风景，连骄傲得目空一切的张五常也自叹弗如。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德伟先生。周先生年龄稍长蒋硕杰先生，也是哈耶克的门徒。如果说蒋硕杰还只是得到了哈耶克的亲自推荐，周德伟则是哈耶克的关门子弟，亲授学生。回到台湾后，周先生担任过台湾关务署的署长，50年代的台湾，关务署署长的宿舍紫藤庐，乃是以台大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学者的聚会场所，这或多或少有点米塞斯和哈耶克当年的朝圣山的意思。张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邻等十余位学术界人士每隔两周在此聚会讨论，有系统地介绍哈耶克的思想。在此期间，周德伟译有八十万字哈耶克巨著《自由宪章》，鼓励殷海光先生翻译了《到奴役之路》。当时在台大就读的学生李敖、陈鼓应、林毓生、张灏等，经常来紫藤庐与前辈观摩交流。这些人统统都是周德伟先生的学术后人。

有趣的是，周德伟在国民党的元老中，是有一定地位的。当时紫藤庐常被特务监视，电话更是长期监听。有年轻人被抓走，家人朋友要么请胡适帮忙，要么就来请托周德伟斡旋，周德伟先生据说是有求必应，为他们打电话，求关系，不过效果甚微。1975年后，周先生旅居洛杉矶，曾写下自传《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书中有很多第一手回忆，据说与国民党官方的历史架构大为不同，一度让国民党的其他元老不爽。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台湾经济学界的掌故，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今天台湾能够有那么令我们眼热的民主自由秩序，华人社会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融入到人类的自由宪政的秩序之中，与当年台湾的读书人的理论探索和舆论参与是息息相关的。自由从来不是别人恩赐的结果，而是需要每个追求自由的人来抗争。夏道平先生就是用他一生的时间来争取自由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台湾的知识界广受尊重，就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林毓生先生是这么评价夏道平先生的：“夏先生是经济学家，他很温和，性格和殷海光不一样，但是坚持完全一样。真了不起，两个人的坚持完全一样，绝对没有放弃，那真是把生命都放在上面，多难啦”。

1995年12月23日，夏先生在台北逝世，台湾的知识分子们张罗着要把先生葬于南港自由墓园，这里长眠着雷震、殷海光等台湾自由

主义的先驱人物，夏先生以他一辈子对自由的坚守和努力，理所当然地在自由墓园里享有一席之地。不过人们很快看到夏先生的遗言，他更偏向于台北士林的基督教墓园。2007年，夏明去台湾纪念祖父百年诞辰，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夏道平先生的墓地鲜花盛开，青草依依，8只羔羊石刻在草丛中隐现。这是夏先生一生的经历，从自由主义者到基督徒。夏道平先生的一生是完美的，他努力寻找自由，然后归于真理，归于永恒。这有点类似于著名的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人生一世，重要的是生命的方向，夏道平先生为我做了一次优美的见证。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pessoa1935@gmail.com）

读蒋彝的传记《西行画记》（郑达 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以前对蒋彝的困惑算是有了一个解答。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有趣的个案，关于蒋彝的介绍、著作、故事，过去都是重点式的，比如，他是把coca cola翻译为“可口可乐”的人，他关于中国书画的著作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80年代传入中国大陆时，又冲击了当时的艺术圈，而他一系列的游记，《湖区画记》、《牛津画记》、《纽约画记》等，以中国游客的身份视角，使得西方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城市和文化，有别样的了解。从得到《中国书法》这本小书，到成套阅读台湾西游记出版的“哑行者游记”（“哑行者”系蒋彝的别号），我就深感困惑，因为你读不到他去国的具体原因，也看不到他在英国的琐事、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艺术上的，更别提长达四十余年海外生活的“人与事”。正是由于缺乏这些细节，蒋彝始终给人单调的感觉。

《西行画记》交代了蒋彝生活事业上的转折点，但更重要的是，它在轻松好读之余，梳理了蒋彝的海外生活，尤其是他的挫败和困境，这让人感到真实。按照以前的介绍，似乎蒋彝的每本书都是成功的，此书则提到，《牛津画记》出版之后，虽然“好评如潮”，但有一位作家在报上撰文，挖苦讽刺蒋彝对牛津的描写，这给蒋彝带来了极大的郁愤。而西方人的赞扬与认同，又往往与彼时彼地环境有关，《纽约画记》出版时，为之作序的著名批评家布鲁克斯就对蒋彝的中国式哲学观大加赞扬，借此抨击当时美国社会的物欲。当然，这些细节还包括了蒋彝的感情生活，他与子女并不融洽的关系，在人际交往中的教训。他也是一位平凡的人，充满了矛盾和弱点。成功的故事有很多种，对蒋彝这样在西方获得成功的人同样如此，如果没有挫折，故事本身也不丰富。读者或许仅仅因为好奇才关心这些人性的幽暗之处，但既是传主不可否认的经历也就必须交代。可以说，读过这本厚达四百多页的传记，蒋彝的故事才算丰满、真实起来。

和蒋彝一样身居海外而又身份如谜的，

还有木心。《文学回忆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1月版）是年初较为轰动的书。1989年木心在纽约为陈丹青等画家开设了一门课，讲述世界文学史，这两部书就是根据陈丹青所记的笔记编成。虽然名之为“回忆录”，却是木心的“文学阅读回忆录”，在这两部书中遇到的是经典著作，要扒开字缝才能看到木心。通过木心的文学观去评价他的作品，至少让只会赞不会弹的文学批评家们赞到实处一些，而普通人借此所了解的，却是作者。“经已出版的木心著作，刻意隐退作者，我相信，这本书呈现了另一个木心。”陈丹青这句话重要，正在于此。

木心是1980年代初出国，1978年，一位文学大师从台湾到了美国，开始了他的第四段人生。生于1925年、经历了现代中国大动荡的山东兰陵人王鼎钧，在回忆录四部曲里把自己的人生作如此划分：18岁抗战流亡，21岁内战流徙，52岁移民美国。他的回忆录也相应地构成《昨天的云》——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怒目少年》——流亡学生的生活，《关山夺路》——内战遭遇，《文学江湖》——在台湾三十年间的青壮年岁月。这四部书在台湾获得了不少奖项，备受关注，今年1月由三联书店引进，其作品系列亦将陆续与大陆读者见面，单就这回忆录而言，堪称今年年初最值得阅读的大书。

王鼎钧作为台湾知名的散文作家，从新世纪开始撰写的这四部回忆录充分显示了他广阔的人生阅历，深刻而豁达的历史认知，

以及在写作上的沉潜与繁复。这四部书互有关联，而又相对独立，可以想像，这位作家在准备写这些故事时，对于何为回忆、何为回忆录、何为历史、何为文体，都有相当周到的认识。《文学江湖》这部关于台湾岁月的回忆录出版后，他接受采访，有以下表达：“我写回忆录不是写我自己，我是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一面写一面好像有个自焚的过程”、“塑像最大的角度是三百六十度，任何人写的回忆录最多是一百八十度，我没有超过，也不应该超过”。近年来关于渡海去台以及台湾白色恐怖的书相当多，抒发家族、个人故事亦不在少数，但《文学江湖》更能体现大时代的氛围，王鼎钧在台湾的三十年，哪怕是在文学圈，他能接触到不少政策、动向，与之浮沉，个人的命运在这里：

五十年代多次奉命写自传，如有差异，即是撒谎，“因此我常背诵自己的经历，比我祷告的次数还要多”。这相当具体地反证了台湾的历史——在“太平洋上的风”使劲吹的年代，大陆对台湾的认识恐怕太停留在现在。

“内战结束前夕，我的人格已经破碎，台湾三十年并未重建完成。”王鼎钧回忆录里最打动人的，是这种勇敢的自省，深入人世地知人论世。在他看来，世上也不止名利，“除了名利之外，还有一样是情，一样是义”，又是何等的充满了人情味。《怒目少年》背后有著名的流亡学校，《关山夺路》底下是国共内战，《文学江湖》则有蒋氏父子与文坛秘辛，都偏重于史的叙述，18岁前的生活记录《昨天的云》在我看来是散文、是叙事诗、是纯粹文学的篇章。有趣的是，王鼎钧在序言里谈到人生的各种“文体”：史诗，长篇小说，连续剧，他则认为人的一生只能是回忆录，“是长长的散文”。通读这四部回忆录，可以这么说，这部长长的散文把其他形式都囊括尽了。Q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盘点1月份的购书清单，最可安慰的是在实体书店购书远超网络，在实体书店购书33种，在网上购书11种。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孰优孰劣，无法一概而论，但对我而言，去民营书店购书是一种难以舍弃的偏好，正如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偏好。

2013年刚刚开始，有一本书已经红遍书市，那就是美国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冯克利 译，三联书店，2013年1月）。内地版有些删节，但这本书的问题与是否删节无关，此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阅读过一些删节的片段，同样觉得乏善可陈。傅高义是标准的“海外友人”，虽然没有像斯诺那样立场鲜明，但还是过于同情理解他的传主。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2012年2月9日）撰文批评傅高义：

往好里说，他本质上是一个“歌颂者”。他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名列第一》一书中赞扬“日本处理基本问题的能力比其他任何后工业国家都要更优秀”，这本书令他名声雀起。他对日本人说，你们对自己的成就过于谦虚了。日本人理应意识到他们的体制优越性，他们“毋庸置疑名列第一”，同时美国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好好清理本国的家务事。泡沫经济破碎后，该书自然归入了清仓处理的廉价书。但在当时，傅高义的吹捧让该书销量激增。后来，他又转战韩国，以同样的热情撰写了《朴正熙时代》（此书为他与其他学者共同编辑——引者注），他说朴正熙是“20世纪最优秀的4位国家领袖之一”，成功地实现了韩国的现代化。在傅高义的万神殿里，朴正熙身旁坐着邓小平。

傅高义关于这位元首的描述以如下问句结尾：“20世纪还有其他领导人改善了这么多人的生活吗？”《邓小平时代》是不知羞耻的谄媚，其中穿插着为了吸引国内读者眼球的姿态性评语。“我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在某个招待会上，当时我离他只有几英尺……”，类似笔调不胜枚举。（朱新伟译）

佩里·安德森把基辛格和傅高义相提并论，实在再合适不过。基辛格与斯诺不遑相让，只不过他去的不是延安，是重庆。佩里·安德森是一位左翼学者，由他来批评中国的“海外友人”，让人对欧美的左翼还能残存一点好的印象。

我愿意在这个冬天阅读台湾作家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三联书店，2013年1月），这四部曲讲述了他从40年代内地到70年代末台湾的经历，是一位写作者的个人史，也是台湾威权时代的文化史。王鼎钧在媒体供职期间，常被“喝茶”。他这样讲述写作者无路可逃的心境：“我站在中共公安的立场上检查自己，有罪；我站在台湾保安司令部的立场上检查自己，也有罪。”王鼎钧经常梦到自己被追捕，陈丹青先生在《守护与送别》（《南方周末》2013年1月17日）里记下同样的细节。木心先生病重期间，已经认不出陈丹青，却不忘说：“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

现在民国已经成为一种范儿，有一部分国粉因为红色恐怖太恐怖，开始为白色恐怖辩护，甚至主张白色可以更恐怖一点，以阻止红色恐怖的到来。但是，如果白色像红色一样恐怖，那与红色恐怖有何区别？

1979年，王鼎钧移民美国，这也使得这部回忆录有了一些遗憾，缺少了80年代台湾转型的见证文字。

欧盟时代，民族国家的界限有些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谈论爱国？德国学者扬-维尔纳·米勒先生的《宪政爱国主义》（邓晓菁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1月）试图寻求新的认同，以宪政理念作为认同的价值。这种“宪政爱国主义”，不仅是欧盟需要的，更是中国所匮乏的。

2013年到了，这是陈冠中先生《盛世：中国·2013年》中的年份，其中许多预言都已提前成为现实。“险中求胜的惟一方法是让老百姓自己吓唬自己，怕政府抛弃他们，怕无政府。……因为怕无政府，怕大乱，大家反而主动愿意在一只并不可爱的巨灵前面跪下，因为只有这只巨灵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就是说让国家成为暴力的唯一合法垄断者，舍此别无选择。”——在去年的915排日期间，反

复想起这句话。陈冠中的新著《裸命》（香港：天地图书，2013年1月），似乎更多地在谈论性爱，但又不是如此。借用一句用滥了的句式：当他谈论性爱时他在谈论什么——且听作者分解。Q

特约观察员 罗四鸰（美国·波士顿，luosiling@gmail.com）

二月是“Black History Month”，走进书店，最显眼莫过于关于“黑人历史”的专架。而2月4日，还是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 ）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因此，这本关于她的传记《The Rebellious Life of Mrs. Rosa Parks》（Jeanne Theoharis, Random House, 2013年1月29日），显得非常应景，但它的海报却深深打动我：罗莎·帕克斯坐在公交车上，冷峻地看着窗外；一位白人男子坐在她后面一排，看着另一边，气氛微妙地紧张。

以前总以为罗莎·帕克斯只不过是一个普通黑人妇女，偶然才卷入到民权运动中去。我甚至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印象，罗莎·帕克斯之所以不愿意给白人让座，是因为她下班回家太累，就坐了不属于她的位置，然后就不愿起来。原来，罗莎·帕克斯很不简单。罗莎·帕克斯出身贫寒，为了照顾生病的祖母和母亲，甚至都没有上完她的技术学校。1932年，她与理发师、民权运动者Raymond Parks结婚，Raymond Parks是当时美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的成员。1943年，罗莎·帕克斯也成为一位民权运动的活跃分子，并担任了NAACP组织蒙哥马利支部的秘书一职。12年后，1955年12月1日，她拒绝听从公车司机James Blake 的命令，不给一位白人乘客让座。于是她的非暴力反抗行为引发了著名的“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公车运动”。她曾回忆自己在Pine Level上小学时（在那里，学校大巴只承载白人学生去新学校，而黑人学生必须自己走路去）的情景：“我看着学校大巴每天经过……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生活准则，我们除开接受之外别无选择。大巴首先让我意识到有一个黑人的世界和一个白人的世界。”而这本传记便记录了罗莎·帕克斯六十年来从事政治活动和民权活动的历程：致力于根除美国在工作、学习、公共设施和刑事司法等各个方面存在的种族等级体制。2005年10月24日，92岁的罗莎·帕克斯去世，美国国会竟然将这个一辈子protest、rebellious的人，专

公车上的罗莎·帕克斯

门与制度进行不抵抗主义抵抗的“国家公敌”称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唉，美国呀。唉，唉，中国呀。

在罗莎·帕克斯的新书海报上，还有她的一句话：“If I can sit down for freedom, you can stand up for children.”初见便不由得一口气念了三遍。有时我想，像罗莎·帕克斯这样的人没被关进监狱，除了政府“无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背后有许多人“stand up”，有书为证——记载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书数不胜数，马丁·路德·金简直是天皇巨星了。不过，我却愿意提一本不怎么光彩夺目的书：《The Long Walk to Freedom：Runaway Slave Narratives》（Devon W. Carbado, Donald Weise），这本书由以思想自由而闻名的独立出版社灯塔出版社（Beacon press）2012年8月出版。在这本书中，两位编辑收集了12个跨度80年的故事，有些是从一些著名的逃跑奴隶故事中节选而来，如Frederick Douglass and Harriet Jacobs，还有一些鲜为人知。这12个故事都是逃跑奴隶的自述，讲述了他们获得自由和公民身份的非凡的、乃至离奇的经历，大致分为四个类型：为家而逃；因宗教信仰而逃；为生活所迫而逃；为自由而逃。嗯，差不多是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非虚构版本。

寒假，受朋友之邀，去一位热爱中国的美国人家玩。一见面，他就在车子里给我们推荐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一本是《Red-Color News Soldier：A Chinese Photographer's Odyssey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Phaidon press,2003)。天啊，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的《红色新闻兵》。于是，这本摄影集也成为这大半个月来的手头书了。

2011年7月，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因收购失败，最终未能摆脱清盘停业的命运，全国几百个零售店同时进行清仓大甩卖。整整一个夏天，每个周末路过Downtown Crossing的时候，总有一个人举着一个Borders正在打折的大纸牌，纸牌上的折扣从七折五折到三折一折，直到9月最终消失了，波士顿市中心那座相当于上海书城的Borders书店最终成为一座空城，至今空荡荡得让人看着发慌。前几天不小心看到新闻，美国第一大连锁书店Barnes & Noble命运也令人堪忧了，最重要的原因依然是电子书与网络书店的出现。我想App版的《安妮日记》必是其敌手。

近日，由“超越故事”（Beyond the Story）制作的数字版《安妮日记》开始在苹果App商店上架。该版本不仅收入了65年前出版的文本，还增添了采访录像和其他背景资料，一些档案资料、照片以及影像是首次公开。在1月27日大屠杀纪念日上，又公开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材料，其中便有安妮·弗兰克躲藏之前的照片，让人得以瞥见她的生活。这些照片收入在数字版的剪贴簿中。这个照片剪贴簿是安妮的父亲奥托制作，保存在巴塞尔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的档案里。基金会董事之一

伊夫·古格曼（Yves Kugelmann）说："安妮的父亲是一个狂热的业余摄影师，在那个时代有些少见，因此我们得以保存数百张影像，大多是这一家人的，也有他们的朋友的。"其中一张照片拍于1941年5月阿姆斯特丹家外，照片里有安妮和她的姐姐以及她们的父母。这张照片提醒着读者们，他们后来失去的自由。所有这些收入App中的原始文件、日记以及影像资料等，都保存在基金会的档案馆里。二战结束后，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生活在那里。档案的收集也得到弗兰克家幸存的直系亲属的帮助，如安妮的表哥贝恩德·伊莱亚斯。他是安妮的一个梦想：在躲藏的日子里，安妮曾在纸上画过一套滑冰的装备，希望有一天能穿着它们和贝恩德在外面滑冰。如今，贝恩德已经87岁，依然在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工作。《安妮日记》出版于1947年，App读者除开可以看到文本外，还可以看到安妮从1942年7月6日至1944年8月4日，与她的父母和姐姐以及其他四人一起躲藏的地方；以及密室外所发生的事情——从录像中可以看到那些秘密帮助受到威胁的犹太家庭的人，或是听到原版的当时的新闻广播。App里还有从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受人怀念的安妮·弗兰克》中剪辑出来的21个片段，以及几个录音，其中一人曾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安妮。

怎么说呢，非常怀旧的我始终觉得App版《安妮日记》很好很好，但仍觉得它不是书。一个朋友偶然感叹，回想上一个蛇年，我还在拨号上网，到下一个蛇年，一切又会有怎样的

《安妮日记》App版

不同呢？我忍不住想，是不是要到博物馆里去看纸质的书了？转念又想，或许又会出现不少《索多玛120天》手稿的传奇，这才释怀。

马奎斯·德·萨德（Marguis de Sade）的《索多玛120天》可以说是十八世纪最惊世骇俗的作品之一。法国国家图书馆在2010年购买卡萨诺瓦的回忆录后，最近正商谈购买萨德的《索多玛120天》手稿。萨德这份写于巴士底狱的手稿，有着一番颇为传奇的经历。萨德1785年被关押在巴士底狱的一间小囚室里，花了37天写出此作。他写在一捆狭长的纸上，然后将这些两面都写满的纸片黏在一起，长达39英尺。害怕这份手稿被看守没收，萨德将它藏在囚室的石缝里。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占，萨德被转到另一个监狱，他写到，因手稿的失去他“流下血泪”。直到1814年去世，他都不知道手稿的命运。但手稿其实并为丢失，它被人发现、转卖再转卖，直到1904年，一位德国医生出版了第一个满是错误的版本。1929年，查尔斯·德·诺尔耶子爵（Viscount Charles de Noailles）买下手稿。他的妻子玛丽·劳拉是萨德的直系后裔。他们将这份手稿传给了他们的女儿娜塔莉（Natalie）。娜塔莉将这份手稿保存在法国枫丹白露家族产业的一个抽屉里。1982年，娜塔莉的一个朋友将这份手稿骗走，带到瑞士，以60,000美金的价格卖给瑞士一位情色作品收藏家杰拉德·诺德曼（Gérard Nordmann）。在经过长期的法律诉讼后，1990年，法国最高法院裁定，这份手稿是被偷走的，应该交还主人。但是瑞士没有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协议（协议要求交还被盗离境的文物），娜塔莉被迫在瑞士继续打官司。然而1998年，瑞士联邦法院裁决，诺德曼购买手稿是“善意的”，自此，手稿被保存在瑞士的一个文化基金里。去年1月，诺德曼的继承人拿出手稿，欲卖给一位法国收藏家。娜塔莉的儿子皮艾诺（Perrone）出面干预：“在法国，任何人想买这份手稿都必须得到我的同意。我母亲强烈希望能把它交给法国图书馆，这也是我的愿望。因为它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法国历史的一页。”

于是，拉辛出手了。自从2007年担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拉辛一直致力于为图书馆收藏一些被认为是“国宝”的手稿，如花了960万美金从一位匿名捐献者手中购得卡萨诺瓦（Casanova）的回忆录，还有法国哲学家米歇尔· 福柯的档案、法国思想家、导演、情境主义代表人物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档案等。现在他正和皮艾诺、诺德曼的继承人协商购买萨德手稿，价格将超过5百万美金，甚至可能更高。拉辛的目标是在明年萨德去世两百周年之际，这份手稿可以和图书馆收藏的萨德其他作品一起展出。

工业革命为什么不会发生在中国

特约观察员 孙骁骥 （北京，sunjiaoji@gmail.com）

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学者不计其数，其中，我却对英国牛津大学的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教授“情有独钟”。这自然是因为他的学术观点对我的思维有所启发。简言之，罗伯特·艾伦认为英国之所以发生工业革命有其独特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并不单像一般人所笼统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带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在他看来，更为现实而深层的历史原因，其实是在于当时英国工人的高工资水平和低廉的燃料价格。

艾伦教授所总结的这两个原因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中国。当年英国的情况不是正好和中国截然相反吗？中国劳动力的低廉价格和相对高昂的能源价格和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两项条件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对比，令我仿佛听见艾伦躲在他的著作背后嘲笑说：看吧，一个充斥着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度是毫无产业创新可言的。当然，艾伦并没有写作一本对比中英两国经济发展历史的著作，我不过是通过他的《全球视野下的英国工业革命》（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年4月）一书展开了一点合理的联想。

虽然没有直接对比中英两国之间的社会经济情况，但艾伦却对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情况作了一番对比，这种比较我认为比孤立地论证为什么工业革命偏偏首先发生在英国更有意义。如果说18世纪中英之间的经济状况鲜有相同之处，那么英国与欧洲的情况则显然是同中求异。当时的大部分欧陆国家均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过渡，而在科学技术的进步方面，法国等欧陆国家完全有与英国并驾齐驱之势，但工业革命还是发生在了英国，可见科技发明并不是它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不是主要的因素。

稍作思考，其中的道理也不难理解。所谓的工业革命，说到底还是得让科学发明与

创新具有“实用”的功能，也就是说能直接投入生产并盈利。中看不中用的科技发明显然是无法触发工业革命的，此外，假如资本家发现投入到生产中的新技术成本过高，导致使用新技术比直接使用传统人力劳作生产时的利润更少，那么也不会有人愿意使用这些技术，工业革命也就压根不会发生。这些恰好都是欧洲地区的社会现实。

英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17、18世纪以来英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增长率普遍要高于欧洲国家，伦敦已经成为了当时世界上工人平均工资最高的城市。这让英国的雇主们绞尽脑汁希望减低人力成本，以便让商品更有市场竞争力。能够代替人力的新生产技术的诞生恰恰与他们的这一经济愿望契合，这使得资产阶级们有了使用新技术、进行工业革命的意愿和动力，而在欧洲大陆的很多国家，低下的工资水平让人力成本比英国低廉得多，工厂主们改进生产技术减低成本的意愿自然低了不少。

再者，劳动力的高工资还给英国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劳动者消费的能力更强。工业革命前夕，相对更为富有的普通英国人的日常开销要高于欧洲大陆人，这些消费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教育和技能培训。据统计，英国1800年的人均识字率为53%，大大超过同时期的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这些国家的识字率大致还保持着中世纪晚期的水平。罗伯特·艾伦写道：“在接受教育和培训之后，英国民众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大幅提高，这显然有助于他们发明创造更多新产品和新工艺。”长此以往，英国便逐渐产生出了数量庞大的熟练机械工

和技师，他们头脑中的奇思妙想也就能更容易地转化为新的生产技术。

在高工资水平的前提之下，英国还“非常走运”地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这使得英国的能源价格比欧洲其他国家要低得多，自然更是低于原先的人力成本了。低廉的能源价格让机械代替人力成为了一桩极为划算的买卖，因为“在能源方面节省下来的开支足以抵补多支付给工人的报酬，尚有结余。”如此，成本低廉的机械生产自然是多多益善，而随着机器代替人力的趋势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成为机械师而不是单纯出卖体力的工人。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高工资待遇逼迫资本家寻求新技术来降低成本，而利润丰厚的新技术的出现又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生产技术的研发。二者互相促进，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

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既有煤炭资源等有赖于天时地利的天然因素，更有不少

人为的原因，重视文教和科学、给予劳动力丰厚的待遇都是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条件。假如18世纪以来的英国人拿着比欧洲大陆工人更低的工资，甚至比使用机器的成本更低的话，那么以机器代替人力从而降低成本的做法就显得毫无必要了，工业革命也就无从发生。

回看工业革命时期的中国，自1738年之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北京的一个普通劳动力工资水平一直徘徊在“勉强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线上。即便到今天，中国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依然是在全世界名列末尾的。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是绝对不可能有足够的财富可以供其投入到教育和技能培训上，所谓的科技创新更是无从谈起，而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在资本家眼里则充当了价格低贱的“人肉机器”。在劳动力比什么机器都便宜的前提下，人们不太可能迎来一个崇尚教育和科技创新的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人的才智和能力并不会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使用。人，与其说是创造者，不如说更像是一个重复劳作的活体机器。

工业革命之所以不会发生在中国，通过对比18世纪以来中国和英国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其中原因不难被我们理解；同理，当我们对比今天中国的平均工资和世界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似乎也很难期待未来的中国会发生某种科技创新或生产革命。当作为劳动者的人的价值被严重低估甚至蔑视的时候，创新，无非是一句空话。

讨薪的中国工人

托克维尔的“反华”言论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中国热议《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配图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在季风书园翻书，听到有人在问《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 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8月），店员回答已经卖完了，正在进货之中。

这样的询问，在近一两个月中国的书店此起彼伏。这本在公众层面常年无人问津的著作在书店大都脱销，甚至有美容店购买了几百本送给顾客。

托克维尔对中国读者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名字，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直到1992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隔一百三十余年。托克维尔的热销，是因为官员的推荐，更是因为人们试图从中发现某种信号。等待信号，是几十年来人们的习惯思维。由于期待的信号迟迟不来，等待信号常常变成寻找信号。尤其是近一两月，人们从称谓是同志还是同事，从上衣的第一粒纽扣是不是扣上，从每一个细节中寻找期待的信号。《旧制度与大革命》来了，自然不会被放过。

托克维尔是值得阅读的作者，但是他的书成为畅销读物，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本书不容易读，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推荐者曾是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成员，理解能力不在话下，但他的下属们或许只能读懂其中的一句话：“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即使这句话也未必能够读懂，他们或许会理解为，既然“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不如保持此前的“稳定压倒一切”。但这绝非托克维尔的意思。

托克维尔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非常复杂，他的家族本身是大革命的受害者，他对大革命有着很多批评，认为大革命复制了旧制度，甚至变本加厉，但是他又承认大革命几乎是无可避免的。虽然从时间上说，大革命往往发生在启动改革的时候，但是不能把先后顺序视为因果关系。从逻辑上说，大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改革，而是因为此前“稳定压倒一切”的局面维持过久，即使有

改革，对平等的诉求超出了自由，“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

此前往往有保守和革命的二分法。保守派认为即使当下的情况再为糟糕，也不应该发生革命，那样会更加糟糕；革命派会认为既然当下的情况非常糟糕，当然有革命的权利，而且力度越大越好，最好是“大革命”。但是在此之外，必须考虑，如何改变既有的情况，同时又避免出现不加限制的“大革命”。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意味着一旦面临类似的情况，只有出现保守的和革命的两种选择，这两个选项从不同方面推动了“大革命”的发生，越是保守，越是证明了渐进的改变是不可能的，非大革命不可。

如果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出了拒绝改革，那恰恰是走到了托克维尔的反面，非但无法阻止反而可能加快“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进程。

如果读者没有耐心阅读全书，又想谈论这本书，建议阅读第三编第三章，这也是书中唯一谈到中国的章节。在这一章里，托克维尔概括了18世纪经济学派的一些观点：国家的权力来自每个人，因此有权教育每个人，建成人人平等的理想国：“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然而，这种平等只是一种幻觉。“在共和政体下，人人平等；在专制政体下，也是人人平等。在共和政体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人就是一切；在专制政体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人一钱不值。”——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这样说。孟德斯鸠的另一部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是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范本。

18世纪经济学派把中国视为“最完美的典范”，托克维尔的评价截然相反，他称那是一个“虚弱野蛮的政府”。托克维尔的说法，似乎是“反华”言论。但是，他所针对的不是某个国家，而是以平等为名进行“民主专制”的做法：“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托克维尔也不同于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家，那些思想家把中国神话，比如伏尔泰把中国称为“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但这些思想家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称赞中国，而是以此为标准对自己的国家进行批判。可是这种神话被中国接受，而且神话被等同于历史。托克维尔对中国的论述很少，但是他在《论美国的民主》里对法国的批判，同样值得细读，每次读到他批评法国的章节，总会感觉就是在讲中国。当然，托克维尔不会如此“别有用心”。

在季风书园，《旧制度与大革命》不见了，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回忆录》，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等依然在那里。Q

现实主义的张力和中产阶级的溃烂

电影《革命之路》剧照

观察员 朱白 （广州，youjinma@gmail.com）

《纠正》（The Corrections）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让它的作者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一举成为美国一线作家，此后《自由》（Freedom）的出版，又让他成为十年来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唯一作家，由此仿佛始昭示出现实主义的某种回归。

从一位在美国获得成功的美国作家身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是简单的，甚至有几分粗暴。但是乔纳森·弗兰岑作为饱读诗书并对小说这门艺术有远见和追求的大作家，他选择“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向，不能不说这是存在取舍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弗兰岑选择了现实主义，并取得了成功。

成功可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利益和口碑，二是弗兰岑在文学向度上取得了与狄更斯、托尔斯泰类似的意义。

现实主义是否正在回潮，这应该是文学评论家们证明和争论的问题，这里只是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来提出，是否属实还要等待日后评说。

总有人说中国没有伟大的当代小说家和小说。倘若这种论断是真的，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总结出一百个，其中一定包括我们无法对自己的现实进行书写。无法书写包含两个意思，无能去写，以及无法去写。后一个不多说了，基本上等同于现状，个人无力改变也是宿命一种。但前一个呢，“无能去写”看似为自身能力所限，其实不然。比如我们的作家可以感受到眼下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持续的时间大概不超过十年，正如我们身处的城市，她的摸样跟十年前的一定大不一样。变迁或变幻，是我们的主题，亦是无法超越的现实。一代人无法在上一代人的生活和人格上找到延续至今的符号，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的一个绝境。不仅中国作家，电影导演、流行音乐家都面临着缺少传承和传统的惨淡。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极尽凌空

蹈虚式的形式主义创作，以先锋小说为代表，在争鸣和蹈浪之后获得极大成功和荣誉，但是事隔二十年，当年的先锋小说有几部还“健在”呢？或者我们还可以认真端详一个作家的细节，比如提及余华，大家都认为他哪部作品最出色？反正我觉得《活着》最让我着迷。而这部作品正是余华抛弃了所谓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之后的现实主义之作。

举再多的例子也可能被称为一叶障目，因为反例也有，且同样为数不少。就单说结论吧，我以为，现实主义是迄今为止小说创作的最恰当形式。二十世纪以来，在人类琢磨和操练了小说的无数种写作形式之后，现实主义的永不过时性已经越来越凸显。语言魅力的集大成者才能成为马尔克斯，思辨能力和体例结构运用炉火纯青才可以跟库切并肩，智商敏感样样都到极点才能靠近卡尔维诺，决绝独立且还能将执拗执行得彻底才能追随塞林格……以此类推，大部分作家并不具备以上素质，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将那些充满光芒的词与自己扯上关系并据为己有，那么还是别费劲了，“我发现了新的形式、新的小说语言”大多时候没那么重要，其程度跟流浪汉捡到了尚未霉腐掉的面包一样，自己高兴，但没必要让全世界都跟着你高兴。

以上不针对疯子和天才。如果你疯了和注定天才，当然可以摒弃一切规矩约束，把十根手指放在键盘上就是了。

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不仅仅体现了现实主义本身的伟大张力，他也是可以自如地运用这种形式的那类作家。上面说了，弗兰

岑就像狄更斯、托尔斯泰一样充满力量。

在《自由》（缪梅 译，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5月）这部长达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没有多少生离死别，但却步步惊心。一切生活场景均在意料之中，平凡、庸常，甚至那些玩意儿不会超过一般中年读者对自己周遭生活的认知，但这里面蕴含的现代生活的荒谬和悖反之处，却常常惊心动魄，那些曾经被你忽略的日常生活中关乎人性的点点斑斑，都被弗兰岑精准而敏锐地捕捉到了。它记录时代，并用之反映那隐秘的人性。

在弗兰岑所着力描写的中产阶级生活画卷中，一种溃烂正在以它不可避免和不可挽回的方式逐渐弥漫。“帕蒂”在四十二岁时没有经过多么复杂的心理斗争，就做出了走到丈夫最好的朋友的卧室里来一场“梦游”的决定，从二十一岁遇见“理查德”到四十二岁终于睡了他，“帕蒂”经历了漫长的人生，你不能说她在这需要两双手反复数

来数去的年月里，一直惦记着摇滚歌手“理查德”的精瘦肉体和迷人谈吐，因为这漫长的日子里她做了很多事，包括跟“沃尔特”结婚，接触他的家人，并与之生下一儿一女，用自己建立起来的家庭取代从前父母给予的那个充满嘲笑和不够结实的家庭……尽管她在她的人生旅途中做了很多，但她仍然没有忘了自己二十一岁时在嫁人前结识的这位摇滚歌手，她终于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关头里把他睡了。

弗兰岑不无刻薄甚至有几分恶毒地帮他们记录着，“三次，总共。一次，两次，三次。一次在睡梦中，一次极为狂野，然后是完整的一次。三次：可怜的小数目。”三次称不上无与伦比的性爱，但在主人公长达二十年的想念以及二十年凡庸琐碎的生活中，竟然被提炼成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最高级享受。与其说弗兰岑要将中产阶级夫妇的生活刻意描写得如此不堪，还不如说生活本身要求当事人经历如此磨砺。

说这就是体面中产阶级光鲜生活的一种背面的话，显然是对乔纳森洞察力的一种低估，照我说，这种隔山打牛的张力和极度冷峻的态度，是乔纳森对人类的一种贡献，类似的生活节奏或破碎细节，不管你是在潮湿的南方，还是粗矿的北方，都总会与之擦肩而过。弗兰岑也借此道出“自由”主题，简而化之就是“有更广意义上的自由，虽然她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自由正在毁掉她……她因为过得如此自由而可怜她自己”，很显然，当你拥有选择的自由时，可能同时也失去了对于人体来说更需要的自由，自由多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好事。必须要理解的是，弗兰岑无意挑战“自由民主平等”里自由，他不是在否认什么，不是在拥护自由的反面，他只是作为一个作家在探索自由带来的一些无可回避的困扰。

对中产阶级下手的美国作家并不罕见，从约翰·厄普代克到理查德·耶茨，还有约翰·欧文，在惯常又充满不安情绪的生活常态中，人们总会把这些让自己动容的生活记录在案的。尽管跟简·奥斯汀、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早前的作家一样擅长现实主义，但集中对中产阶级下手，并在破碎糟糕的生活中独辟蹊径出一块空间，让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在此生存，甚至可以偶尔自由呼吸，这是这代美国作家的独特贡献，也是使之区别于十八、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地方。

理查德·耶茨曾经在《革命之路》（侯小翊 译，重庆出版社，2009年4月）中对吵架中的夫妻有过出色的描写，那些破碎的生活在破碎和无解前，最令读者着迷，他们是梦中人，而读者是清醒的，那种对峙和凌辱甚至可以超越一场战争对人性的摧残。生活总是难免呈现出一幅无解的状态，在理查德·耶茨让一心想重新站在舞台上的妻子处于内心与现实纠结中时，在约翰·欧文笔下的身为大学教授的老婆与学生偷情被作家丈夫发现之后，在弗兰岑让“帕蒂”与“理查德”独处在湖畔小宅之时，你也许会发现生活原本就已很糟糕，我们只是在它糟糕之时做出一两个选择，而这些选择不能影响它糟糕的本质，但或许可以让自己短暂地快乐一下。

当背叛是生活中绝少发生的一幕时，你得承认，背叛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快乐，而非真的是什么婚外恋和一两次配偶之外的性交让人快乐，因为它——背叛，本身可以改变你原有的生活轨迹。你原以为可以就此远离先前那种焦灼和无解，但其实它仍在控制你的生活，这或许才是悲哀之处。

至于无解的困境是怎么造成的，又该如何避免，当然没有一个作家可以给予你答案或启示。正如你家厨房中米面袋子里生长出来的飞虫，它们是哪一天降临你家的，它们是基于怎样的衡量最终决定在你家的厨房中排卵、生出幼虫进而再孵化成可以翩翩起舞但只有一周生命的小飞虫的？这些基本上无解的问题，即便你本着科学探索的精神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也很难对其进行根本上的杜绝，你知道，除非把包括你在内的生物链斩断某一环节，否则这个已经平衡的生态系统势必继续下去。

说点实在的，《自由》本身非常好读，传统的阅读快感分毫不少，对语言的熟练运用令读者在流畅阅读之时，还可以恰好感受到文字的魅力和思想内涵——这已经足够令评论家和出版商兴奋了，他们不惜再次将已患老年痴呆的马尔克斯端出来，称眼下这部《自由》为“像《百年孤独》一样的世纪之书”。

对腰封上的文字，人们基本已经学会视而不见，极端者甚至会做出相反判断。但这句“像《百年孤独》一样的世纪之书”似乎还有点意思，比如形式上，弗兰岑用力的也正是一个家庭的蹉跎故事，夫妻及其子女、朋友或者邻里，他们之间的关系衍生出人生中的一些称不上享受但也无从回避的故事，爱欲、温情，当然还有背叛、亵渎和伤感。更重要的是，弗兰岑几乎掌握了语言的魔力，你甚至还可以说这种魔力正是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已经诞生的那一种：复杂的从句，但逻辑性彪悍，即便过分冗长和繁琐，也不影响读者对意思的领会。没办法用华丽的形容词继续称赞弗兰岑了，也许《自由》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好看”，它能不能为中国作家明晰自我的一种化学试剂呢？这大概也是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Q

“东瀛屐痕”之一
——“散都”东京

特约撰稿人 刘柠 （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阔别四年半赴日。日本时间晚9时许，出了羽田机场，乘上京急空港线赶往东京市内的瞬间，我便融入东京——这座超大、超魔幻的都会的节奏中，竟无半点“违和感”。

从深冬积雪的帝都，在“穿，还是不穿”（秋裤）的纠结中来到东京，从东南方的东京湾方向吹来的温暖、湿润的煦风令人陶醉。从入境头一天起，羽绒服便成了挂在商务酒店单人间墙上的多余“摆设”。

林文月说京都是“心灵的故乡”，对我而言，东京则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是我在北京之外，唯一居住、生活逾三年的城市。按说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经历过“摊大饼”式的城市化进程，内心该多少有种“一览众山小”式的“优越感”——世界最大都市，非帝都莫属，可到了东京才明白这种“优越感”之虚幻。说实话，我至今弄不清北京与东京到底哪个更大，也懒得做数据考究。但无疑，东京，这座江户时代

东京街头的演出

便是世界最大城市（江户）的都会，在经过关东大地震（1923年）和东京大空袭（1945年）后的两度重建及战后大规模的城市化之后，今天，涵盖了“首都圈”（即包括首都周边的埼玉、千叶、神奈川等七县的一体化区域）的大东京，的确保持了世界罕见的“巨无霸”型大都市的记录。相信每一个涉足过东京，体验过密如蛛网的铁道线和蚁群般麇集在站点的观光客，都能感到此言不虚。

东京像一个巨大的魔兽，无时无刻不在生长、膨胀，至今未已。进入21世纪以后，新开通了大江户线、副都心线等地铁线路，超大型综合设施六本木新城（Roppongi Hills）开业，旧东京站改造工程竣工，新地标天空树（Sky Tree）落成……可以说，东京变得更“深入”（如新建大江户线的六本木站位于地下42.3米）、便捷，更“通天”（天空树高达643米，成为东京的“天线”）、魔幻，也更后现代、更刺激了——可这些并不是我最关心的。令我耿耿于怀、念兹在兹者，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东京的“散指”。所谓“散指”，即“散步指数”，是笔者的造语，顾名思义，指适宜散步与否及适宜的程度。在我看来，一个城市在多大程度上适宜散步，直接关涉到那个城市之宜居与否及生活与其中的市民的幸福度，兹事体大。而既然人的幸福可以用“幸福指数”来量化，那俺为什么不能独创一个曰“散指”的新词呢？爱谁谁！

毋庸讳言，对“散指”的关注，其来有自，照例源自自身的问题意识。问题的背后，是自己生活的本土城市已不宜散步的不堪现实。吾友、学者汪民安曾撰文，如此谈论他所居住的地界——望京：“望京是一个没有街道的地方，到处是高楼，到处充斥着大马路，里面就是没有散步的地方。在这里生活很乏味，每天想出去走走，就是没地方可走。我总是在想，为什么这个城市要变成这个样子，变成一个无法散步的地方？”对此，笔者感同身受，因为我也住在望京，与汪宅只相隔几条街区。汪说：“北京现在越来越大，你出门只能坐车，后来我发现对北京这个城市我越来越没有什么感受了，你的行走，就是永远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整个路途都与你无关。慢慢地你会发现，整个城市都同你无关，你只是对城市的某个地点，某个你要抵达的地点感兴趣，因为城市的细节没有了，城市的多样性和秘密没有了，城市的街道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车道……”于是，你从A地去B地，唯一关心的，便是交通手段和时间成本。或乘公车，或打的，就事论事，直截了当，而不会去关注沿途的风景和城市的表情——这使我们的出行成了单纯的负担，加上日益升级的交通堵塞，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焦虑和厌烦。

在这个意义上，东京仍然是“散指”颇高的城市——堪称“散都”（散步之都），尽管其人口和机动车保有量均跻身世界最高水准。漫步东京街头，你可以相当从容。尽管周围西装革履、手拎公事包的上班族们步履匆匆，公路上车流如织，速度很快，但

你不会感到任何困扰：步道虽窄，但铺装整饬，几乎每一寸面积都经过精心的设计，风格与路旁的店铺、街树及周边环境高度协调，连下水道的井盖都宛如艺术品；行人默默行走，秩序井然，绝少看到痰迹和纸屑，更没人在路上吸烟。笔者曾亲眼看见乌鸦和鸽子落脚在步道的栏杆上，与过往的行人仅隔10公分，却彼此相安无事。乌鸦、鸽子与一片灰西装“擦肩而过”的街景是一个隐喻，道出了现代都市与自然的和谐并非不可能。客观上，东京的鸟类和流浪猫、狗之多，令人叹绝，且全然不会有怕人的意识。

普通街道如此，遑论步行者天国。繁街闹市，多辟有步行街，称为“步行者天国”。有的地方终日如此，有的则分时间带：时间一到，机动车绕行，行人信步马路中央。天气晴好时，艺人在街头卖艺，90后男女练习街舞，鸽子们照例闲得无聊，四处溜达，从不远处的车站方向，间或传来政治家的竞选演说……对这幅构图，所有人都见怪不怪，因为它早就定格成了超日常的生活风景。

如果说东京是散步之都的话，相信日本地方中小城市的市民会真心不爽。要知道，那些离海岸更近、空气更清新、环境更清洁、历史更悠久、地域文化更富特色的地方小镇，不仅有温泉名汤，有的还保有古城楼、城墙和护城河，徒步三四个小时便可绕城一圈，简直是天造地设的绝好散步道。然而，与之相比，东京的街头散步则更丰富、更刺激，更富于意外性和感官性，更“粹”。

我一向爱读东洋作家谈东京（江户）的书，从田山花袋、永井荷风、奥野信太郎、

东京街上散步的女子

吉行淳之介，到水上勉、川本三郎、四方田犬彦、福田和也，从三岛由纪夫、池波正太郎，到寺山修司、荒木经惟，东京仿佛是一本永远也谈不尽的天书。东京像一个巨大的生物体，在几代文人的谈论中成长、变形、扩张——地上的建筑物越建越多、越来越高，天际线越发狭窄、尖锐。但始终不变的，是城市的文脉和韵律，或者说文化。东京有无数超高层建筑的顶层都设有可供市民免费赏景的了望台，有的可360度旋转。无论从那个视角俯瞰脚下的钢混密林，人们仍会不约而同地在第一时间辨识富士山、皇居、新宿御苑、东京塔和自己的家。用荒木经惟的话说："没法子，东京跟我的生理合拍"，是"我的子宫"。

日文中对散步的表达主要有"散步"和"散策"之二种，今天在语意上几乎无差别，但笔者更倾向于后者。"散策"系源自中国古语的文言，原意为扶杖散步，杜甫有诗云"北风吹瘴疠，羸老思散策"（《郑典设自施州归》），即作此用。在现代日语中，"策"之原意已消失，成为一个"虚词"，与"散"共同构成一个名词（时而动词化），意为适性随意地溜达，而在语境上，与"散步"有微妙的温差，在笔者看来，多少有种文士情怀和诗意的氛围。日本的作家、学人，当他想到住家周边的公园或涩谷、表参道一带溜达一趟的时候，一般会说"散步"；可当他想到神保町书店街或银座、日本桥这类地界闲逛的时候，则多半会用比较老派的"散策"。

永井荷风酷爱散步，其传世名作《濹东绮谭》可以说就是一部散步之书，荷风也因此而有"散人"（荷风散人）之称。虽说当年荷风散步的地界主要是玉之井（即今东京都墨田区东向岛一带，战前系私娼寮和脱衣舞厅、风俗酒廊集中的花街之一）一带的下町，远没有那么阳春白雪，但他老人家穿西装、戴礼帽、拄手杖，是真正的"散策"。因此，荷风散人当是散策之人。

也正是在类似的语境下，东京——这个我心中的"散都"，是散步之都，确切说，当是散策之都。

沙弥澄真

观察员 成庆 （上海，veron.cq@gmail.com）

我是在台南乡间的一间寺庙见到沙弥澄真的，事后想想，要在那样一个地方遇到澄真，无论是从世俗人的概率算计，还是从佛法的因缘角度来看，都算得上是一次奇遇。

七月的台南，炽热而慵懒。这是一座透着浓浓乡土气息的南部城市，人们游走于各种神祇、菩萨塑像与美食之间，烧香祈福与口腹欲乐能如此毫无矛盾地融为一体，可谓是这座古城的特别风味。不过，我此行的目的地却是座落于台南城外的一间普通寺庙。

台南城内，寻到一家日式民宿，女主人的娘家恰是那间寺庙所在的楠西区，试探着向其打听，女主人却是一无所知。而且言下之意，对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大陆客，跑来探访一家连本地人都不知情的寺庙，更多的是某种疑惑。

稍对台湾佛教有所了解之人，多少会对台湾四大丛林有所耳闻，即法鼓山、佛光山、中台禅寺以及慈济功德会。汉传僧团在当年内战之后，于台湾一地筚路蓝缕，最终形成这几大丛林，在佛法的修持、教育乃至

“小普陀”

慈善等方面发展出各自特色，可谓是相当不易的成就。

不过，假如有人认为这即是台湾一地汉传佛教的全貌，或许只看到了当年渡海至此的巨流波涛，而未见随此巨流而隐伏其下的涓涓溪水。当年因兵燹之灾而涌入的汉僧，除却星云法师、圣严长老这些赫赫有名者外，多数来台僧人密布于岛屿各地，或弘传乡间，或著书立说，或隐或彰，也多少在塑造着这座岛屿上汉传佛教的面目。

此行要探访的乡间寺庙，与天台宗有着密切的关系。主持寺庙的法藏法师虽出生于台湾，却与当年那批渡海而来的大陆僧人有着深厚的因缘。如战时自大陆来台的忏云长老，以及出身观宗讲寺的显明法师等等。汉传佛教在那样的时代际会之下，能通过这样的传承形式于此地播种生根，喟叹过后，或许更为强烈的感受则应是一丝侥幸。

次日清晨，搭乘一日之中为数不多的巴士前往隐于乡野的那间寺院，台南本地人热情好客，短短的旅程，就有人热情邀约我等一同驾车游历当地著名道观，且有基督徒观我尚具善根，亲切地为我一行传布福音。台湾宗教光谱之斑斓，在台南的山间便已体现得淋漓尽致。

寻到目的地，顺利地拜谒到法藏法师，蒙其慈悲摄受，为吾等开示天台教法以及对于大陆佛教的若干观察。法师近年来数度前往大陆，尤以太姥山、天台山诸道场为多。在其眼中，汉传佛教的承传必须有强烈的宗派性格方能真正复兴，而不能如今日大陆汉

传佛教那样，几乎所有寺庙都呈现出一种面貌，甚或大量庙宇不仅没有明确的宗派修持传统，而且往往沦为旅游名胜与祈福场所。因是天台宗的传人，故法师对于天台山的未来尤为关注。据闻，天台山今日尚未如四大名山那般成为兜售名胜的旅游景区，也与法师在天台山的一席发言有莫大的关联。

吃完午斋，知客师带至殿前相赠法物。一来一去之间，知客师唤来一黝黑壮实的小沙弥，只见他于师前双膝跪拜合掌，请示指令。在那电光火石间，在我头脑中，竟浮现出“反封建”的念头。这等礼仪，在吾等所受“社会主义接班人教育”中，大多是作为“封建习俗”而加以废除与批判的。这位小沙弥如此自然地跪拜于年长师父前，却又让人觉得，这样的礼节，并无常人所想象的“封建“与“压迫”。只是，在世俗社会强烈要求平等的观念氛围下，这个小沙弥，对这里的一切又到底是如何思维的呢？

图为圣严法师

交待完杂事，知客师相告，可让此沙弥带我等去寺庙公园一游，此园又名“小普陀”，而且之后不忘补充一句，引路沙弥出身大陆，与我等关系较近。寥寥数语，更添疑惑，大陆少年，何以能在此地出家？

思绪间，小沙弥已引领我们快步进入公园。名为公园，“小普陀”实为各种山石、池水依着自然地形而形成的一大块自然园林，内有多种菩萨、天龙护法造像夹杂于山石之间，尤以观世音菩萨为甚。小沙弥健步如飞，竟也不管我等步履蹒跚，几步下来，我们已落在后面，不得不急唤，“缓之，缓之”，脚步才终于放慢。

边走，边听他介绍这座略为荒芜的园子，才知因寺庙常住人力不足，故疏于打理。路过一潭水洼，指道，此地原有大蛇出入，后因外人繁杂，蛇已消匿无踪。就在这一停一指之间，我端着相机偷拍了他的不少背影，虽其年龄尚小，但威仪行持颇有古风，与人交接，不卑不亢。这样的风貌，不仅在大陆难寻影踪，就连在台湾所见常人，也少见这样的身仪。这让我更添兴趣，此处何以能培育出这样的沙弥？

终于到达公园高处的凉亭，我建议在此稍作休憩，顺便一聊。才知道他名澄真，父亲台湾人，母亲则为云南人氏。

一来二去，彼此稍更熟悉，他也逐渐放松，将其出家经历和盘托出。因父亲早逝，故他一直在昆明求学，其有一兄，于云南出生，所以未能如他一般，获得台湾居留许可。兄弟二人早年因家庭变故，都有厌离世间之心，辗转于大陆数个道场。只是其舅为玉石生意人，强烈反对外甥剃发修道。其兄曾为出家，逃至一山林隐秘道场中，欲拜一老比丘为师，此师略有神算，对其兄言，汝与吾无缘，在此暂住一月即可，一月之后，家人将来此地领汝回家。月余之后，其舅果然开车来寻，其兄只能回家从事玉石生意，至今对澄真能渡海出家表示艳羡。澄真本人因出生在台湾的因缘，故能于此地出家，而且其舅虽欲用强力逼迫其还俗，但终因台海阻隔，不能越洋干涉。

听罢其传奇的出家经历，吾等脸上大概浮现了惊异神色。而他更是不缓不急地反问我，你可否受了皈依？法名为何？又为何来此地拜谒法师？我只能一一作答，顺便对天台宗及法藏法师的讲法弘化及修持也多有由衷的赞美，听完我言，澄真还逐条加以补充，并给我讲说了法藏法师与此间寺庙的种种神奇轶事。如二十年前一比丘尼梦于此地修建庙宇，且梦中人指引，二十年后将有比丘接收此道场。经过二十年的苦心经营，果然与法藏法师结下梦中之缘，将此道场顺利交付。此事虽神异，但讲说时，澄真却神态自如，如谈庖厨琐事，无凡人一惊一乍的轻薄。有时想想，今人多受唯物论及常识经验主义的熏陶，要么对宗教之“神秘”嗤之以鼻，或就是易入“五迷三倒”之神鬼之道，佛法的正信在于对一切世间不解之现象，均能以合理的见解加以融摄，故才能呈现出某种“中道”的气质。

这一切无疑令人惊异，这位年仅十五的

沙弥，于教理的认知，于佛法的正信，乃至对自身生命的方向，均透露出一般世间成年人所未见的自信、笃定乃至成熟。而且他于自己的性格阙失、不良习气多有自省，坦言往日脾气过于暴躁，经过此地的数年学修，如今才略有好转，不复暴戾。

这样的坦诚与谦卑，于成年人尚属不易，况乎一束发少年？对谈至此，我的肩背之间，已是冷汗凛凛，不知是一番奔走之后的凉意，还是相形下的自惭形秽所致？

这样的身范，出自于台南僻远处一间普通寺院的寻常沙弥身上，或许不能单单解释成此家寺院有何特别神奇之处，而是让人突然觉得，这千余年来汉传僧团的某种僧格的特有风骨，正借由沙弥澄真向我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令人能够真实地触摸到在大陆已难寻觅的传统。我于佛教教典史籍间所苦苦寻觅的那一丝隐秘的“气息”，不正是这样的示现吗？

震惊之余，我当然涌出一丝“千劫难遇”的惺惺之念，于是试探道，汝既与大陆有缘，当学成后回乡助宣佛法。他憨憨回道，师父早已对其多加勉励，让其志存高远，未来好回大陆大作弘化之事。

一番闲聊，彼此告别，嘱其多加珍重后，我走出寺院，心中仍有波澜泛起。与这位沙弥的因缘虽算奇特，但我更为关切的是，这般传统、朴实且具宗派性格的佛法修持传统及僧格风貌，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历史不堪之后，还是否能于大陆再度复现？

或许，沙弥澄真的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图为沙弥澄真

随笔

ESSAY

徐志摩为什么反对苏俄

撰稿人 林建刚（ linjianganghaizi@163.com）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之后，在面对苏俄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此时，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苏俄这种暴力革命的方式很是警惕，因此很不赞成中国效仿苏俄，他们认为中国如果走苏俄的道路，很可能迎来一场灾难，王国维在给朋友柯绍忞的信中曾写道："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与这些年长的知识分子相反，李大钊与陈独秀对苏俄则充满了希望，他们认为这场革命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毫无疑问是历史的进步，因此主张中国走苏俄的道路，后来为此更是组党干革命去了。与李大钊、陈独秀不同，胡适一开始对他们在《新青年》上谈政治谈主义很不以为然，当时的胡适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希望从教育思想文化方面入手，给中国奠定一个非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基础。然而，1926年胡适在访问苏俄时却对苏俄产生了迷思，胡适表达了对苏俄的羡慕之意与赞美之情。纵观这一时期，在年轻一代的著名知识分子中，对苏俄从各方面提出批评与反思，进而提醒国人警惕苏俄的反倒是诗人徐志摩。当胡适、陈独秀等充满思想洞见的知识分子还沉浸在苏俄迷梦中的时候，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却成了苏俄的反对者。人们不禁要问，徐志摩为什么要反苏俄呢?

一

徐志摩的访俄见闻

其实，同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徐志摩对新生的苏俄充满希望与期待。这源于徐志摩对社会主义的好感。留学美国期间，徐志摩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这一时期徐志摩读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对社会主义大感兴趣。与此同时，留美期间，徐志摩的精神偶像罗素也曾大力颂扬苏俄，因此，这一时期的徐志摩自诩为一个布尔什维克。

引起徐志摩对苏俄疑虑情绪的也是罗

素。对苏俄称颂备至的罗素在游历苏俄后，思想起了大变化，他开始公开谴责苏俄的思想专制。这一时期徐志摩读罗素写的苏俄游记，思想上不太接受罗素对苏俄的批评，还曾对苏俄有所辩白。然而，当1925年徐志摩亲自游历苏俄之后，跟罗素一样，徐志摩也开始反思并警惕苏俄。这自然与徐志摩在苏俄的观感有关。

进入苏俄，徐志摩首先感受到的是苏俄民众的穷困。在《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中他写道："入境愈深，当天人民的苦况愈发的明显。"这不仅是当时徐志摩的游苏观感，也是瞿秋白当时的观察，当时瞿秋白曾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访问苏俄，《饿乡纪程》就是瞿秋白这一时期在苏俄的观感。瞿秋白将苏俄称为"饿乡"，里面也是写到苏俄民众物质生活上的穷苦。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明知道苏俄民众生活穷苦，瞿秋白依然一心一意学习苏俄。徐志摩看到了苏俄民众的穷苦，这不符合他对苏俄的希望，因此不得不对苏俄持一定的保留意见。

在莫斯科，徐志摩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莫斯科的街道上有男子抱着吃奶的小孩在街道上走。这种怪现象的背后，在徐志摩看来，源于苏俄规定的"一个人不得多占一间以上的屋子"的法律。苏俄政府对民众的私有财产（尤其是房子），依法没收，然后重新分配。这里徐志摩看到的是苏俄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而这自然也会引起徐志摩的反感。

徐志摩最不能忍受的则是苏俄对书籍的查禁。徐志摩崇拜托尔斯泰，因此去拜谒托尔斯泰的女儿。从托尔斯泰大小姐的口中，徐志摩知道，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书在苏俄都差不多绝迹了，其中有一些是被苏俄政府查禁，原因是他们的著作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对此，徐志摩写道："假如有那么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比如托尔斯泰的，就会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即便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怎样？……假如这部分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

另外，引起徐志摩担忧的还有苏俄革命时期的革命领袖的铁面无私与血流成河时的红色恐怖。对于革命领袖列宁，徐志摩写道：他（列宁）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而对于革命时期的惨景，徐志摩也曾写道："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人民穷苦，政府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与此同时政府还查禁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书籍，革命领袖冷酷专断，这些就是徐志摩游历苏俄时看到的现象。而这些行为，在视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的徐志摩看来，无疑是不能接受的。

二
"仇俄友俄"讨论时期的徐志摩

正是有了这一次的苏俄游历，徐志摩对苏俄产生了警惕之心。而当徐志摩回国之后，正是国共合作准备北伐时期，因此各种赞美俄国的声音出现在报刊上。徐志摩回国之后恰好主持《晨报副刊》，于是在他的主持下，知识界展开了一次仇俄还是友俄的大讨论。

首先是陈启修在《晨报》发表《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在文中，启修认为苏俄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它没有侵略中国。需要指出，苏俄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引

起知识界的同情，还与苏俄这一时期的对华外交政策有关。一战后，作为战胜国，知识界对于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普遍比较乐观，然而，在巴黎和会上，最终的事实却是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这一残酷现实使得原本对英美国家抱有很大期待的知识分子对之转为反感。而在此前后，苏俄曾向中国发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这不能不使中国知识界对苏俄产生好感。后来胡适在反省他对俄国的看法时，就曾说他曾一厢情愿的抱着"总希望革命后的新俄国继续维持他早年宣布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的立场"，然而，苏俄对华的一系列宣言大多则是口惠而实不至。

与陈启修认为苏俄没有侵略中国相反，徐志摩坚决认为当时的苏俄正在侵略中国。为此他曾编发两位青年读者陈均和陈翔的反驳陈启修的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徐志摩对苏俄侵略的看法，陈均在反驳陈启修的文中写到："苏俄之抛弃宣言，继续占据中东路；唆使蒙古独立；中俄会议延不举行；最近之擅捕华人……种种举动，是否不

含侵略的色彩？”比陈均更进一步，陈翔则从政治、经济、文化、治外法权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苏俄对中国的侵略。

“仇俄友俄”讨论的后果，徐志摩没有料想到。主张亲俄友俄的陈启修主持了左翼学生、工人参加的群众集会，集会之后，亲苏俄的青年学生竟然将《晨报》馆一把火烧掉。这场大火进一步激发了徐对苏俄的反感，原本只是观点的争论与思想的争鸣，却遭到亲苏俄学生的火烧报馆，这不啻为对个人自由的暴力侵犯，而这些在徐志摩看来“如饮醉酒”的中国青年所以如此，则又不能不归功于苏俄的宣传。事后，徐志摩在《灾后小言》中写到：“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可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徐志摩心中无形的信仰自然是他视为至高无上的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与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集体暴力是格格不入的。

与此同时，青年喻森的人生经历也让徐志摩对苏俄的恶感增加。喻森是一个左翼的中国青年，对苏俄充满美好的向往，于是到了莫斯科去朝圣，徐志摩在参观莫斯科时两人还见了面，相谈甚欢。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纯洁的青年，在他所热爱的苏俄没有任何自由，在他组织相关集会拥护苏俄时却遭到了苏俄军警的逮捕与羁押。原本对苏俄极度崇拜的喻森思想上不能承受现实中苏俄的种种残酷，由此成了一个精神病人，住进了苏俄的精神病院，此时跟喻森关系不错的青年人，为了让他回国，曾写信向徐志摩所在的《晨报》求助，知道了此事的徐志摩曾写文章痛斥苏俄对中国青年的戕害。

三
徐志摩与胡适的论争

1926年7月，胡适游历苏俄后思想左转，开始公开宣传苏俄的成就。对此，徐志摩给胡适写信质疑胡对苏俄的看法。作为自由主义者，对于独裁，两人都是深恶痛疾的，但胡适认为苏俄可以通过“狄克推多式”（英文dictator的音译，原指古罗马共和时期在紧急状态下被赋予军政全权的执政官，衍生义泛指独裁者——编者按）的新教育来造就一个民治政府，而徐志摩不认同苏俄式新教育可以造就一个民治政府。那么，苏俄式新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呢？吊诡的是，当徐志摩询问胡适看到了什么样子的苏俄式教育时，推崇苏俄新教育的胡适却没有看到新教育的内容，他所看到的是苏俄教育的统计。由此，徐志摩判定胡适被苏俄的假象蒙蔽了，而胡适之所以被蒙蔽，除了胡适呆的时间短（只三天）外，还有就是苏俄政府的刻意蒙蔽。徐志摩曾说：“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先预备，掩长暴短。”此前，英国历史学者威尔斯参观苏俄时，苏俄就曾通过训练学生造假来蒙蔽威尔斯。因此，在徐志摩看来，胡适所看到的苏俄，都是苏俄政府想让胡适看到的苏俄。而这种苏俄，其实是苏俄的假象。

那么，真实的苏俄新教育到底有什么内容呢？徐志摩提供了答案，在《〈一个态度〉的按语》中，徐志摩写到了他所知道的苏俄新教育：“但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他们侧重的第一是宣传的能力，第二

是实用的科目，例如化学与工程，纯粹科学与纯粹文学几乎占不到一个地位；宗教是他们无条件排斥的，那许是好事，但他们却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拿阶级战争唯物史观一类观念来替代信条。”

后来徐志摩在《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答张象鼎先生》中再次论述苏俄新教育，他写道：“当然在共产主义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了。正如中世纪有异端这个巧妙的观念，现代的苏俄也发明了一个巧妙不相让的名儿：‘反革命’；收拾异端的方法是用火烧，对付反革命的手段也是同样的不含糊——你们都听见过苏俄的‘欠夹’不是？这是一个‘不容时期’的复活。”

对于这样的教育，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和徐志摩自然都持反对的态度。可惜，胡适在苏俄受了假象的迷惑，并没有看清苏俄党化教育的本质。

多余的居民

观察员 言一 （成都，richard7briner@gmail.com）

据中央社记者蔡和颖台北(2011年12月)24日电：耶诞夜寒流到，民间团体今天出示影片，抗议台北市政府安排清洁工半夜在万华艋舺公园洒水以驱赶游民，台湾当代漂泊协会代表批评政府在寒冬没送暖，反而泼冷水。台湾当代漂泊协会当日上午在立院召开记者会，公布一段在12月11日晚间11时万华艋舺公园拍摄的影片，影片中身穿委外清洁工作背心的人员在警察在场情况下进行洒水清洁工作，坐躺在公园地上的游民纷纷走避。协会并出示台北市议会公报10月27日工务部门质询记录。根据记录，议员应晓薇说：综合地方建议，要求台北市公园路灯管理处在上午6时与晚间11时进行清洁工作；应晓薇说 “我认为大范围执行清洁工作，绝对是在用智慧的方式解决游民问题”。

在上述的这则新闻报道中，19世纪波德莱尔笔下颇具浪漫色彩的漫游者（flaneur）一词，如今已在台北这样的现代都市中彻头彻尾地沦为了一个被污名化的词汇，已成为一个困扰当地政府的问题(problem)。于是，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question）便是：这样的沦落是如何发生的呢？

然而，上面这一提问其实不无误导性。漫游者一词的浪漫色彩与其说来自于主体自身，倒不如说来自于波德莱尔身上的诗人光环与读者的各式联想。一旦对于波德莱尔或是本雅明有过更加深入的阅读，便会明白，漫游者作为一种主动选择下的游民，更多地意味着一种与新兴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都市，乃至新兴资本主义个体的深刻决裂。这样的决裂是需要洞察和勇气的。当一个人选择游离于都市的商业体系之外，游离于新兴个体所组成的“大众”（the mass）之外时，他也必然面临着上述体系与人群对于他的遗弃。只是，在19世纪的巴黎，虽然已历经奥斯曼的改造，却依然足以为波德莱尔这样的都市波希米亚人提供庇护，让他们不至于凸显，成为政府需要去应对或解

蒋兆和所作《流民图》

决的问题（problem）。从而，提问的重点实则在于：从19世纪的巴黎到21世纪的台北，究竟是当中怎样的变迁，使得都市不再能轻易为波希米亚生活提供庇护，使得“游民”凸显为一个都市问题（problem）？

细读前面新闻中提到的“工务部门质询记录”，会发现“洒水清洁”这一手段本身是不容忽视的细节。首先，洒水清洁所造成的驱赶效果是无意中被发现的——公园管理处原本不过是公式化地进行本职工作，并没有任何驱赶的意图在内。可是，“卫生”与“清洁”这样的词汇本就是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概念，或者说是近现代的一种发明——不论对东方还是西方而言，“卫生”都是一个19世纪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下的现代观念。都市住房的结构与洗浴设备的演进过程皆是上佳的佐证；只是，东方都市在迎接现代的“卫生”时，更是多出了一场如罗芙芸在《卫生的现代性》一书中所描述的“观念入侵”的历程，一次对于“卫生”的缓慢而艰难的消化——因此，在这里的“洒水清洁”本质上是作为一种具体的都市公共空间治理术而出现的，并碰巧成为了一面透镜，在议员的建议下将存在已久的艋舺公园游民问题以一种暴力的方式凸显了出来。

同样是在该记录中，我们可以读到，在各位议员乃至当地里长眼中，游民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problem），理由多是在于他们会让周围的居住环境变得脏乱，会带来各种（潜在）的安全问题。然而，正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所指出的那样：有些时候，人们所感受到的脏乱（dirty）并非全然是一种客观的，可通过技术来测量的肮脏——比如细菌种类与数理，而更多地是源于错置（displacement）所带来的不适与不安，也因此部分地与一些禁忌密切相关。显然，对于那些安居乐业的居民以及都市管理者而言，出现在他们周围和眼前的居无定所的游民们确乎然成为了一种错置，带来了肮脏与危险的感觉。

台北艋舺公园的无家可归者

另一方面，福柯曾在其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指出：自中世纪起，安全问题便是促成城镇（town）治理技术产生的重要因由；而在进入近现代之后，由于数目字管理的发展，安全问题的治理更是渐渐地出现了由律法（law）到政策（policy）的让渡——也即，在处理近当代都市安全问题的时候，罪与罚已不再是都市管理者思虑的重点；取而代之的是，如果要让犯罪率降低到某一人口比例，政府需要付出多大的实施成本。事实上，这一成本的考量亦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应晓薇议员的发言中——在发言记录中，她曾数次提出要考虑洒水所导致的游民索赔的出现。

至此，不难发现，从漫游者到游民，其间真正发生着巨大变化的远非过着波希米亚生活的人群，而正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日益现代化的都市；游民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本质上亦是源于在都市治理术不断演进之下的嵌套与突出。从而，当我们试图去谈论和分析“游民问题”时，需要面对的也正是都市治理术对于“游”（mobility）的管控与对于 “民”这一主体身份的隐性建构。

游民之“游”

在国外的文献中，多数时候与 “游民”一词相对应的英文词是“homeless”， 意指居无定所或无家可归者。这样的一种对译，反过来提醒着我们：在都市中，如果从移动性（mobility）这一标准来看，那些通常位于社会底层的鳏寡孤独在日常生活中的移动能力和移动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远不及那些已然在都市“定居”但需每日通勤且不时出差的白领。换句话说，都市的通勤白领或许要比通常意义上的“游民”本身更接近于字面意义上的“游民”。由此，也足以反证：游民之“游”，其重点与其说体现在mobility之上，倒不如说落于因游离而产生的“不定性”（uncertainty）之上——与白领的朝九晚五相对，游民的日常作息、行为出没，皆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而这种不可预知性恰恰是都市治理术希望能尽量缩减乃至消除的目标。表面上呈现出的都市管理者与游民之间的矛盾，实则是游民身上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与寻求可预知性的都市治理术之间的本质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语境下，游民一词往往易与“流民”混用，泛指一切居无定所与四处流浪的人口。然而，在严格意义上，二者之间有着重大区别——简言之，游民的日常大多限于都市空间之内，流民的日常却往往奔波于都市与乡野之间。在中国历史上，因灾荒与战乱举家举村背井离乡远行乞讨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但这样的乞讨人群在最后大多都倾向于重返故土。当然，他们中的一部分或许选择留在城里讨生活，也因此从流民变成了游民——也即，游民原本部分的来自流民与乡民，但其身份却是在他们选择“定居”于都市之后才最终定格。也正因为此，游民问题可称得上是都市天然的疾患——大概没有一个地方/空间比都市更适合，更便于这些底层人口以各种卑微、灰色的方式谋生——如果条件允许，人们总是更愿意选择在第五大道乞讨而不是去到某个不知名的山乡，不是么？

上述游民与流民间的区分，也部分的在日本游民史中得到了印证。在Miki Hasegawa所撰写的We Are Not Garbage!: The Homeless Movement in Tokyo, 1994-2002一书中，作者曾详细对比了日本从战后至70年代的游民与90年代后涌现的游民（homeless）所具有的不同特征。研究表明：战后的游民广泛地由年轻男性，女人与儿童，乃至整个家庭所组成；90年代后的游民则主要是中年，单身的男性。这样的分野，无疑足以佐证战争在催生流民这一层面上与灾害等事件的同质性，并使得流民最终区别于游民；而其中人口组成的变迁则更进一步证明游民的产生与都市本身的蔓延息息相关。

同在中文语境下，无论是游民之“游”还是流民之“流”，似乎都在悄悄地呼应着“江湖”这一隐喻味十足的词汇。仿佛比起“庙堂”而言，江湖才是属于游民与流民的“空间”——从字面上看，的确是江河湖海才更适合游弋与流动。至于“三教九流”这一耳熟能详的传统称谓，更从数目字上明示了游民其“职业”或谋生技能的多样性，而该多样性恰恰包含着对于都市包容性空间的潜在而硬性的需求。

故而，我们或许可以说：游民其之所以为游民，之所以成其为问题（problem），乃是因为他们游离于都市治理术的掌控之外，成为了一个不可预测的变数。然而，由于游民与都市空间的共生关系，游民注定无法作为一个都市管理的问题被解决（fixed），反将作为一个特定的都市现象而长存。

游民之“民”

事实上，无论是台北艋舺公园的案例，还是日本新宿车站的驱赶事件，都足以明示大众：对都市里的相当一部分游民而言，他们尽管没有固定的家屋（home/house），但却占据着固定的场所（place）。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游民是拥有固定居所的。那么，这反过来亦暗示着都市治理术所希求的确定性远非是关于居所/房屋本身的固定，而是更加精密地落在了以居所作为起点与终点的日常作息节奏之上，也即Lefebvre口中的calendar——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时间之维的管理和规

训。有趣的是，这一管理和规训又恰恰是经由不同的空间来具体实施的。

如若以白领日常作息为线索对当代都市空间进行简单分类，大致可得：居住空间，通勤空间，工作空间与消费娱乐空间。可被分类，也就意味着可预测（predictable）——在不同的作息空间，人们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半透明的，也因此是可管理的。相比之下，游民拥有着相对独立的生活作息节奏。只是由于该节奏与活动空间都大大异于包括都市管理者在内的大众（mass）认知范围而呈现出某种破碎，不连续的状态，变得不可见，难以被管理，仿佛掉进了都市的缝隙，成为了不易被察觉的灰色维度。

就是这样一种不可见与被漠视，却在不经意间指向了“江湖”的另一种喻义：亚文化或地下文化。这既意味着游民群体内部本身会产生出一种基于日常生活know-how的亚文化，也暗示着游民个体与其他遭受污名化待遇的地下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比如，在今敏的《东京教父》中，在圣诞夜踏上为弃婴寻找亲生父母之旅的游民三人组便是由退役的自行车手，性倒错者与离家出走的少女所组成的。他们最初的同行与合作正是源于对彼此游民身份的认同，而旅程中的各种分歧则巧妙地回溯到各自成为游民前的生活——有时候，人们恰恰是因为首先融入了某种亚文化之中，才进而变成了游民；在变成游民之后，从前的亚文化背景亦可成为帮助其解决麻烦、达成目标的助力——我们甚至不难想象，同样的寻找之旅，如果通过正常的（normalized）途径来展开，比如警察机构，反而有可能无法通行或是无果而终。尽管电影出自虚构，都市传奇亦无法被证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着这样的地下世界/文化才让都市变得充满了可能性，变得斑斓而迷人。而今敏所成功呈现的，亦可谓是“游民眼中的都市”。

理应留意到的是，影片中游民三人组的不同身份背景以一种最为直白的方式向我们宣告了当代都市中游民的源流——或者说，当代游民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前文的论述已略有涉及。作为一个总体的他者，游民无疑是站在了都市治理术的对立面；作为一个个碎片化的具体个体，在相对微观的层面，游民的生成则意味着家庭的破裂——不仅仅是没有house，更是没有home——虽然在当代都市中是存在所谓“游民家庭”的。此时，再结合过往游民与当代游民的不同人口（demographic）特质——从大面积遭受战乱灾荒的人群到一个个互不相连的独立个体——不难看出：当代游民的产生与个体化社会的形成密切相关。事实上，这也是为何福柯会在《安全、领土与人口》的中篇回溯到了基督教牧领制与教区的出现：一方面，基督教所谓的牧领制可被看作是治理术最初的雏形；另一方面，这样一种重在管理灵魂的制度完全仰赖于被基督教教义从天主教教义中释放和形塑出的新兴个体——强调个体灵魂与上帝的直接沟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督教的诞生以及牧领制的推广几乎是为当代都市治理术的成型作出了双重铺垫。

如果说福柯的著作更多的是一种对于

历史的考掘，那么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则具有相当的前瞻性。首先，个体化社会的兴起本身便是对传统家庭的一次撕裂。过往大家庭（extensive family）被渐渐拆散成更小更独立的小家庭（nuclear family）。独立与灵活的代价，是家庭抗风险能力的降低。在社会微观的一端趋向个体化的同时，宏观的一端却是在朝着贝克所指出的“风险社会”前进——个体的日益解放，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再加上全球化的联动效应，风险变得随处可见且难以预测。每个人都担心下一个失业破产的就是自己。当然，风险社会的风险绝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萨特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完全可被妥帖地改写为：他人即是风险——每一个不稳定的、被解放的个体，都是风险。或许正因为这风险乃是基于个体的解放，贝克才会说：（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之上。任何人都可能因为一次事故，一次投资失败，一次失控的赌博，一次暴力的宣泄，一次命运的捉弄（如侯麦的《狮子星座》）而成为当代文明都市中的游民。颇为反讽的是：游民本身恰恰被都市治理体系（system）认定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都市中，风险生产着风险。

隐藏的游民

作为一种巨大的变数，一种（部分地关乎于安全问题的）风险，游民是为都市治理体系所不容的；出于都市里的公共场所的分割与挤占，出于错置所带来的不安，游民亦是不为“居民”所喜的。在这一双重否定之下，游民彻头彻尾地成为了都市中多余的居民（unwanted habitation），成为被都市所遗弃的人口。进而，福柯著作中的另一关键词“领土”在此成为了“战场”；“战争”在都市每一个或大或小的空间中悄然展开。

在这场战争中，游民并非总是孤立无援的。不少公益组织会以人道的名义站在游民的那一边，甚至还会发动自身资源试图通过影响都市政策来消减都市治理术。然而，正如日本游民运动的无疾而终所昭示的那样：这样的行为无异于与虎谋皮，亦是未能看到游民与都市的共生特质。物质上的援助对于游民个体而言，或许足以挽救生命，却往往难以拯救灵魂——看看《东京教父》就会知道作为个体的救赎需要一种怎样的巧合与奇遇。

因此，就个人而言，都市的游民问题实际近乎于一个伪问题；或者说，本身并不成其为一个问题（problem），而只是都市百态中的某一现象。与其以此为出发点去讨论管理抑或拯救，倒不如在考掘游民历史的基础上试试能否瞥见未来游民的“新衣”：随着个体流动性的持续提升，不少白领正渐渐变成“隐性的游民”——尽管在某个城市有固定的居所，但在该居所中实际居住的时间却十分短暂。由此所带来的，是空间/领土边界的进一步模糊化，是人口统计中的变数的递增，亦毫无疑问的是一种关于安全问题的风险。从而，这样的流动性个体究竟会对类似于家庭这样的社会微观结构做出怎样的拆解，如何催生出新的都市治理技术，或许才是真正值得关注与探寻的问题（questions）。Q

宝岛生态访学记
——我的台湾交流见闻

撰稿人 何鑫（上海，hexin17@126.com）

好事多磨，经过颇费周折的证件办理流程后，十月中旬，我终于踏上了前往宝岛台湾的访学交流历程。和多数进行两岸高校交换学习的同学不同，身为博士生的我主要是通过实验室之间的交流合作，自己与台湾师范大学的相关领域老师取得联系，在得到对方同意后，利用母校与台师大的合作平台得以前往台湾访学。因为是个人联系交流，不是集体交换，所以很多事情需要亲力亲为，但这也未尝不是一种锻炼，从一开始就让我收获很多。

真正踏上宝岛的土地后，还未卸去舟车劳顿，我期待已久的学术课题访学马上就纷至沓来，能够亲身参与台湾这边的相关课题研究、学习交流体会对方的野外实验正是自己此行的主要目的。带着这样的身心准备，在赴台的第三天，我便匆匆离开台北市，和台师大野生动物研究室的同学们一起前往位于南投县和花莲县交界区域的奇莱山进行野生水鹿的研究。

奇莱山的主要区域属于已颇具名气太鲁阁国家公园，不过我们前往的区域并非通常旅游者前往的太鲁阁峡谷等景点，而是真正人迹罕至的高海拔地区。说实话，去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会遭遇怎样的情形，回来后才得知奇莱山地区曾经发生过数次震惊全岛的山难，可想而知此行的登山路绝非普通。跟着实验室已多次进行野外研究的同学，我们每个人背着20公斤以上的行李，步行穿越三座山峰，从海拔3000米的登山口先降至海拔2500米左右的成功山屋，然后再上升至海拔3300米的首日营地，第二天再下一个山脊后利用绳索攀上几乎是垂直断层岩壁的海拔3607米的奇莱北峰，最后再经过下山脊和翻越海拔3400米的磐石西峰后最终到达实验区域。这一番路程直线距离将近10公里，而实际所走的山路若非亲身体验实难用语言描述。而这样的课题调查，实验室的同学有的人已经在研究期间走了20余次，实在令人钦佩。利用两天的时间到

达营地还是水鹿研究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八天时间里，我们搭设了捕捉水鹿的网阵，轮流守夜，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成功捕捉了2雌1雄3只水鹿，进行了体征的测量、身体样本的收集以及跟踪项圈的安装，随即释放。

说真的，虽然在上海我也在进行鹿科动物獐的野外追踪，但还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真正在野外接触过如此大体型的兽类，除了欣喜，更多的是震撼！活生生的野生哺乳动物就生活在这人迹罕至的高山密林和草甸上，如此真切的场景让第一次看到的我感动地说不出话来，地球真的不是只属于人类的！于是更加钦佩实验室的同学们，相比而言，在上海进行动物生态学研究的我们所面临的野外实在和这样昼夜温差近30度的3000米海拔高山无法相比。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这里的同学以及同行的志工、原住民向导、跟拍的公共电视台记者和摄影师为着更好地保护台湾野生动物的信念坚持努力着，更让自己感触良多。

十天的高山野外经历给我带来了众多震撼、感动和值得珍藏的回忆，在和台湾朋友相处的过程中，我更感受到台湾居民远远领先于我们的、对于生态保护的意识。离开高山后，我前往位于台中的台中市野生动物保育学会，这是实验室的博士学长开办的民间野生动物救助机构，里面收置着诸如短耳鸮、鹰鸮、东方角鸮、领角鸮等猫头鹰，红隼、凤头蜂鹰、黑耳鸢、黑翅鸢等日行性猛禽，果子狸、鼬獾等野生兽类以及众多的野生蛇类。这里每天都有从事不同职业的民众充当义工，为救助的野生动物测量体征、喂食、清洗笼舍。在这里的每一天几乎都有市民送来捡到的野生动物，待动物痊愈后我们便一同到郊外放飞。随后我还曾代表台

中野保学会前往位于南投县集集镇的台湾特有生物研究中心参加野生动物救助的研讨会和工作坊，了解到与会的动物救助机构涵盖了政府部门、单位、高校、民间团体、个人等众多开办形式，实在让人感叹台湾的野生动物保育观念真是深入人心，而大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台湾的其他日子里，由于自己和实验室的专业研究内容和兴趣所在，我又陆续走访了台北的关渡自然公园和阳明山国家公园、台东的原住民社区红叶部落、屏东的垦丁国家公园、花莲的太鲁阁国家公园、台南的台江国家公园以及台北野鸟会、台湾猛禽研究会等机构，并参加了两岸环境教育研讨会、两岸环保NGO交流会等与生态环境议题相关的会议，在这些与自然保护相关的领域同台湾从事这一行业的官员、学者、义工和普通民众们有了更多、更为广泛的交流。在台湾，除了大家来台湾旅游都能够感受到的民众的热情好客、环境的整洁卫生外，我体会到了许多更深层次的内涵，也就是台湾社会所具备的更多的人文关怀。

正是在这样的有关人的平等互助的思想支持下，台湾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例如在公园甚至街头，经常可见的环境教育导赏牌介绍着这片区域的环境、植被和常见动物；在众多的旅游场所，与台湾的环境保育、植物和动物物种有关的纪念品更是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在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有连绵不绝的车辆带着自驾游客、社区民众和学校学生在合理设置的自然导赏设施后观察野生动物和它们的生活环境，并聆听专业义工进行解说；更不要说众多类型各异的书店中为数众多、让自己爱不释手、已经购买了大量的自然类书籍了。这些场景都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我会时常

台中市野生动物保育学会收养的花浪蛇

和台湾结交的朋友谈论这些情形，并感叹从整体而言大陆还在慢慢的起步中，很多有关环保的地方令人叹息。但是，他们总是回应我，台湾在20年前也是这样过来的，保护野生动植物和栖息地很重要，但真正的自然环境保护除了这些，一定要在人上下功夫，这需要环境教育的不断普及和努力，需要时间的积累。

“大陆很快会迎头赶上的！”他们会这样鼓励我，我也由此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无论是我所从事的野生动物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的野外学术研究，还是我自己一直努力在课余时间所做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的普及，我们都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也是自己努力的方向！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相信同台湾一样，在大陆我们也会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的真正和谐共存，希望更多的大陆同学今后来台湾不仅仅是课堂上的学习和旅游，更能体会到台湾人对于台湾这座岛，这里的生态环境和动植物物种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自豪。正像台湾朋友所说的，我们需要与时间赛跑，需要不断迎头赶上，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深水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6月）

独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